

部落粮仓的“化石”

郑明升 文/图



时庄遗址考古现场

2020年5月，“2019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结果出炉，河南淮阳平粮台古城址入选。这座从上世纪80年代就已开始发掘的龙山时期古城遗址，经过50年的考古论证，终于有了确切的名分。遗址发现我国最早的方城、最早最完整的城市排水系统和最早的车辙，将中国造车历史前推了500年，对国内城市史和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更有实体价值。无独有偶，就在这座古城址东20公里的淮阳时庄村，考古界又有新的重大发现。2019年12月3日的《光明日报》以《河南淮阳“时庄遗址”疑现四千年前粮仓》为题披露了此消息，省内媒体也对此作了报道，参与发掘的北京大学考古专家从遗存物品的特征进行

初步判断，这极可能是龙山时期的粮仓，也是目前发现的先秦时期罕见的最早粮仓。也许不久之后，这里会有更多的发现，爆出更多的考古硬料。

周口地处黄河中下游的黄淮冲积平原，淮河最大的支流颍河穿境而过，《山海经》记述，“颍水出少室山，入淮西北”。在我国的古代史上，龙山文化距今3500年~4000年，是大汶口文化的延续，此时处于黄河中下游流域黄淮腹地处于新石器时代。《史记》记载，此时正值禹征三苗时期，是中原部落拓展期和向夏王朝过渡的准备期，虽当时的中原部落还没有更多显现出地域边界等国家性质的主要元素，但由于部落之间的争战和掠夺，已经有了相当强大的军事力量存

在，物资储备成为必备的保障与支撑。淮阳时庄遗址这座粮仓的出土，恰好印证了当时中原部落的经济发展，在部落物资储备方面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平，这对我国夏王朝前期，中原部落向国家演变酝酿的研究，提供了准确的参考实证。出于职业的敏感，周口市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对此产生了很大兴趣，刘宏伟局长是个“粮食通”，此前正筹划一篇关于粮食文化方面的材料，因为缺少粮食历史的素材还没落笔，怀着对粮食和物资储备文化及历史的浓重兴趣，我们便相约去时庄，走进这处遗址，身临其境地感受那段远古粮仓的历史文化氛围。

仲夏是中原的雨季，雨特别多，为避开炎热，我们选择下午去看，赶到时，天又下起了阵雨，发掘还在如常进行，因为时庄村党支部书记时兴荣是熟人，他便成为我们的第一向导。眼前的发掘现场已经显示出相当大的规模，发掘的土坑已有数千平方米，深度几米、十几米不一。可能是出于现场保护和防雨多方面的考虑，已挖掘过的地方大多用布篷掩盖，只有一小部分裸露在外。发掘人员对挖掘有价值的点位，都进行了符号标示。从现场实景和考古人员拍摄的图片可以感觉到，考古人员已经发掘出了不少有价值的实物：地下数米处土坑内，圆形的夯土圈、土坯，方形的围墙都有明显标示。工作人员介绍，在已探孔的38平方千米范围内，现场已发现25处圆型土圈、多处方型土坯及数米圆型夯土墙，墙围内还发现有仓储类遗存物，有当时人的住所，及生活垃圾和陶片，周围还建了排水系统和护城。经碳-14鉴定，已经发掘的这处遗址可能是龙山时期的台地，圆形的高台土圈极可能是当时储存粮食和盛纳其他食物的粮仓。

由此，我想起了中原地区发现的另外一处龙山文化遗址——偃师二里头遗址。那里也发现了两处与此处相同的圆形土圈，考古专家对二里头遗址的圆形土圈认定为祭祀用物。作为同时期遗存物，为什么时庄遗址发现的圆形土圈不是祭祀用物而可能是粮仓？有关专家的解释是：圆形土圈用于存放物品，如果为祭祀，通常是一个或两个且距离很近，像北京天坛和地坛，而时庄遗址发现很多圆形土圈，且是不规则建筑，不可能是用于祭祀，极可能是粮仓。在2020年河南省考古研究成果交流会上，有关专家把时庄遗址初步定性为“龙山时期区域性官方仓储城邑”，至于是不是专门用于粮食储存，或者能否有更多发现，还有待考古学者进一步挖

掘，用自然科学的手段进一步论证。

人是自然界的重要成员，在追求生存的过程中，与自然的博弈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数千年前人类严峻的生存状态，无时无刻不考验着当时人们的生命和生存本能。《史记》开篇《五帝本纪》记述，轩辕时代，人类就在中原大地上种植五谷，有节度地使用水、火、木材及各种材料；舜20岁时，就制作陶器；禹治水有功，得到舜的禅让。这片遗址所发现的圆形土圈粮仓、陶片、排水等，无不与这些记述存在着深刻的关联。“有节度使用”目的是为了储存，人类生存环境恶劣的时代，人们开始想到把维持生存以外的物品储存起来，作为备用。禹以“排”之法治水成功，得到人们拥戴，此后，排水广泛用于人类的生产、生活，用于保护城邑、粮储和居住的场所。在青铜器未发明之前，陶器成为人们生活的主要器具，直至今天仍与我们息息相关。时庄遗址发现的圆形土圈、土墩、土坯、陶片等所有器物，在当时人类生活中普遍运用，直接反映了龙山时代农耕文明的成果，无不体现了祖先的智慧。

撇开考古者的思路，我眼前好像浮现出了另外一个场景：拉纤躬背的先民，在可狩可猎、可耕可收的时节，把多余的粮食和物品集中起来；装运的简易木质轮车，艰难地行走在收获和储放的途中；人们把物品运到此处储放，以应对漫长寒冷的冬天或备于本部落与其他部落的战争所需。也许，他们艰辛的付出只为一份来年的播种和希望，只为了本能的生存和繁衍生息，一代接着一代。但他们曾经生活的痕迹、不经意间留下的历史标志，成了一个农耕民族精神皈依的佐证、一个不息追求生存的记忆，启蒙着一个生机蓬勃的现代，也许这才是遗址的价值所在。

数千年前的喧嚣和繁华已演变为遗址和“化石”，起初的功用早已废弛，只留下一层层夯土，但我们不应忘记，这是祖先崛起的所在，是部落先民从无奈的疲于奔命到养精蓄锐的精神栖息地，是蒙昧跨向文明的起点。当我们现在走进这里时，它用另一种方式面对人们，以沉淀后的新面孔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我突发奇想，脑子里突然萌发一连串的问号：时庄遗址距平粮台如此之近，又属同时期的建筑，城邑与粮仓之间有无关联？如果有，谁是它们的主人？同处古宛丘，与传说中的伏羲、神农部落是“远亲”还是“近邻”？不论结论如何，数千年前的繁华都清晰地昭示着这里曾经发生的文明，一个关于先秦、关于农耕、关于城邑的故事和梦想。

周口市美术馆 与名家对话

作为从周口走出去的书法家，丁谦在采访中把自己最真诚的想法和盘托出，对家乡的情谊、对家乡书法爱好者们的殷切期盼都在采访过程中缓缓流淌。另外，他还对青少年书法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

“一杆斋”和“万籁草堂”都是丁谦的斋号，现今“希言斋”即将成为丁谦的新斋号，对丁谦来说，这不仅是斋号的变更，更是心路历程的转变。

请您问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习书法的？学习书法的初心与动力是什么？有哪些深刻的感受和体会？

丁谦：我练习书法是比较早的，从六七岁时就开始描红习字。学生时代的我心气儿很高，写字画画、诗歌小说、吹拉弹唱……什么都想弄，曾经发表过小说、诗歌、报告文学、摄影作品等。参军入伍后，紧张的部队工作与生活把我那些不切实际的梦想碾得粉碎，我痛定思痛：伸开五个手指不如攥成一个拳头，四面出击不如集中作战。于是，我决定集中精力，把主要的业余时间用在书法上，其他的则作为辅助。这样多年来，取得了明显成效。现在回想起来，我很庆幸自己的选择。

初学书法，纯属一种爱好。我在家里排行老二，上面有个哥哥，我们哥俩经常比着写，谁写得好母亲就给谁奖励，自然是哥哥经常胜出。那个时候，我的愿望就是赶上并超过哥哥。到了部队以后，一批书画爱好者聚在一起互不服输，较着劲儿地练，有一种不干出一番事业不罢休的劲头。再到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书艺的提高，学习书法有了一种弘扬国粹、责任在我的使命感。

一路走来，我最深刻的体会就是一个人要想做成一件事情，必须有长期坚持不懈乃至终其一生的毅力。我一直觉得自己算不上聪明人，但我有一个优点，就是有毅力，只要是认准的事情，一定会坚持不懈地做下去。我1976年入伍，1977年开始高校招生，上大学是我的梦想，当时心里头憋闷了好久。我暗下决心，一定要考上这一课。1979年，我报考了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苦读五年，成为解放军总后勤部自修完成大学本科学业的第一人，被总后勤部树为“两用人才”标兵。后来，我又参加培训班进修书法，四处拜师，刘炳森、沈鹏、欧阳中石、李铎、张海诸位先生给予的教诲使我终生难忘。

有人觉得，书法写起来很轻松、很容易，其实内行人知道，练习书法是一个十分漫长而又艰辛的过程。我以前的斋号叫“一杆斋”，取自李白“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的故事，寓意对练习书法的一种坚持不懈的努力。后来，改名为“万籁草堂”，因白天工作较忙，所以读书写字时间一般在晚上十点至凌晨一两点，也是在夜深人静、万籁俱寂的时候，所以叫“万籁草堂”，这是字面意思，内含的寓意是追求一种天籁、地籁、人籁三籁合一的万籁境界。现在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了，我又给自己酝酿了一个新的斋号，叫“希言斋”，取自《道德经》“希言自然”。学习书法是一种享受，一种生活的乐趣，一种由表及里、由肢体到心灵的愉悦，在今后的生活中，我也会越来越享受书法带来的乐趣。

您认为青少年应该从哪些方面了解和认识书法？

丁谦：书法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一种文化艺术形式，几千年以来，始终伴随着中华文明的进程而演变、发展。近年来，整个社会都在全力以赴，正本清源，竭力弘扬祖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书法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青少年正是学习知识、增长才干的时候，对于书法，年轻人应该学习，更应该有所了解。林语堂先生说：“只有在书法上，我们才能够看到中国人艺术心灵的极致。”不懂得中国书法及其艺术灵感，就无法谈论中国的艺术。”书法被誉为无言的诗、无图的画、无形的舞、无声的乐，可以说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就是书法艺术的发展史。作为年轻人应该懂得书法艺术博大而精深，不仅应该欣赏外在的形式美，更应该感受到内在的意境美，进而从中吸取传统文化、修养身心、开阔视野、增长才干。

从【一杆斋】『万籁草堂』到【希言斋】（上）

记者 王晨

从《与谈明府论修筑三岸书》说张镇芳

杨箴廉

张镇芳(1863年~1933年)，字馨庵，号芝圃，今项城市秣陵镇闾村人。光绪壬辰科(1892年)进士。历任天津道、长芦盐运使，署理直隶总督等职。民国成立后，任河南都督兼民政长，曾任天津盐业银行董事、董事长。1933年，病逝于天津。

清朝末年，灾害频繁，兵祸之外，尤以水患为最。人民渴望安居乐业，贫者欲达其言，劳者须歌其事，怎样治理好水患，使人民得以安定，是社会舆论的焦点。张镇芳了解到人民的疾苦，作《与谈明府论修筑三岸书》一文，以反映人民的呼声。早在洪武三年(1370年)黄河溃决，直抵溵水。沙河冲决，流入项境，百余里一片汪洋，生灵死者千万计。乾隆四十七年及道光二十三年，省西杨桥口支流漫溢，由朱仙镇抵西华，由西华抵沙河，幸有南岸拦阻数目日。由苑寨开口，直抵南顿谷水，幸有谷岸拦阻数目。我项以北数十里，尚无波臣。

按古之治河之常法有二：一是疏通河道，清污以导水。但此法需大量人力财力，又耗费时日，实施不易。其二是加固堤防。堤防加固，收异曲同工之效。尤其是在汛期，此法最为实用。

例：乾隆二十六(1761年)年秋，黄河决堤，流入沙河，南岸溃决，由颍岐口注入项境谷河。知县梁作文带病率吏民，于南岸筑堤，大半县免遭水灾。又光绪十三年(1887年)八月，黄河于郑州决口，直达周口入颍，苑寨新站南岸沙河将崩。项人张海晏及监生杨崇德率人补筑薄堤，加固险段，终保无患。这些成例，张镇芳早已了然于胸。

文章初载《项城张氏族谱》亥集，后被收入《项城县志·丽藻志》。张镇芳

1893年任户部主事，《与谈明府论修筑三岸书》当写在出仕之前，即在家乡项城生活期间。谈明府，即谈国政，广东驻防汉军，镶白旗进士。光绪十二年(1886年)七月任项城县令。十四年(1888年)七月，西安安邑廪生武育元接任其任。谈在项城县令只有短短两年。张镇芳写此文的时间应在1886年7月至1888年7月之间，即其中之拔贡(1885年)之后的两年之内，在项城生活期间。因那段时间他常接触乡邻，易了解民间疾苦。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张镇芳保慈禧太后和光绪帝“西狩”长安，两宫回京后被恩赐四品衔，在农曹任职，以后就很少有机会接触乡邻了。

笔者殊不知书，只是平时爱好读书，夫子之墙干仞，不得其门而入，仅以一读者身份，说说个人的理解和认识。谈，是彼此对话、交谈或座谈，又为姓。明府，《历代文选》注释：汉时指清明的府君，汉以后是对长官的尊称即“明府君”的省称，唐以后则多称县令。由此推知，当时项城县的执政长官姓谈。张镇芳为将收集到的社情民意反映给本县长官并恳请实施，方写下此文。

文章旁征博引，理明词畅，始终围绕修筑三岸为中心。三岸筑，水患杜，人民不再受其侵害，从而安居乐业，生活得以稳定。由此可知，张镇芳在考取员后，即萌生出了解民间疾苦、关心民生的念头。张镇芳一生做了不少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乡亲的好事。

其实，张镇芳一生最大的功德是将张伯驹培养成为胸怀博大、品格高尚，具有无私奉献精神的一代名士。张镇芳是张伯驹的嗣父。1905年，张伯驹即随张镇芳到天津就读。张镇芳教育

您求援，中不中您说一声，我回去也有个交代。”张镇芳满脸赔笑说：“修板桥的银两您老来的当天，我已派人送去了，我想让老师您多住几天，所以一直没说。”夏老轩回项后，果然钱早已送到。他逢人便说，张镇芳如何尊师敬师，此事迄今被传为美谈。

张镇芳居世之美德，早被载入方册，流传于世，为世人喜闻乐道。

附《与谈明府论修筑三岸书》：

为黄河冲决，殃及地方，恳筑堤防，以救生灵，以护城垣。缘黄河自古为灾，豫患，其殃及我项也有二：一为经流冲决，一为支流漫溢。考明洪武三年，自省西开决，经流洪波直抵溵水、沙河。由沙河冲决，直抵我项虹河。其时城尚未立名，为殄寇镇。镇四围数百里汪洋，东南直抵淮水。死者何止数百万？此经流冲决，为害最甚者一也。

本朝乾隆四十七年及道光二十三年，省西杨桥口支流漫溢，由朱仙镇抵西华，由西华抵沙河。幸有南岸拦阻数目日，由苑寨开口，直抵南顿谷水，幸有谷岸拦阻，我项以北数十里尚无波臣。此支流漫溢为害较轻者，二也。

今我项所持者三岸，沙岸、谷岸、汾岸。汾岸起自国初，而沙岸北百里，谷岸南倾五十里。汾岸近城西北十余里，东北近城仅八里，如能三岸修筑，水至沙岸，由沙岸以御之；水至谷河，有谷岸以御之；水至汾河，由汾岸以御之。水势即杀，则为患不烈。上以保城垣之崩溃，下以免生灵之涂炭。今之急务，未有过于此者也。

用敢特恩仁天，饰近三岸各牌绅民，协力筑之，则经流、支流均不至冲决漫溢矣。

溪烟枫紫桂丝细雨薰花时
少年成名老大吾道付逶迤
终有効心在闻雞坐欲驰
宿人之天福夜生之岁中秋之月
宋人之天福夜生之岁中秋之月
丁谦书法作品

丁谦，中国书法家协会六届理事，中国硬笔书法协会副主席，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理事，中国榜书研究会副主席，中日韩书画联谊会副会长，丁谦书法艺术馆名誉馆长。其作品先后十多次荣获国际、国内大赛一等奖、金奖，搭载神舟九号、十一号载人宇宙飞船遨游太空，并作为国礼赠送国外首脑和世界政要。近年来，其先后在北京、河南、山东、广西、甘肃等地举办书法展，2013年至2017年连续五年在北京荣宝斋成功举办书法展。出版各类毛笔、钢笔书法字帖50余种，发行数百万册。